

□纪习尚

在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的蒲松龄墓园内，立着一座“柳泉蒲先生墓表”石碑。石碑通高178厘米、宽69厘米，正面刻着清代淄川名士张元撰写的蒲松龄生平事略，背面刻蒲松龄夫妇生卒年月、蒲松龄著作表等。这个石碑保存了重要史料，在蒲松龄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原碑在1966年人为损毁，现存石碑是1979年重立的。

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二十二，蒲松龄在家乡淄川辞世，享年76岁。蒲松龄早年刻苦读书，立志在科举中获取功名，他19岁时应童生试，取得了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但之后的乡试屡试不第，直到去世前几年，他才以72岁的高龄授岁贡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蒲松龄“既屡试不利，遂肆力于古文”，他在教书之余写就的《聊斋志异》彪炳文学史册。

清康熙五十四年，蒲松龄和妻子刘氏合葬在蒲家庄东一里许的祖茔内，当时没有立碑。清雍正三年春，在蒲松龄十周年忌日之际，蒲松龄长子蒲箬召集亲属商议，众人认为蒲松龄一生成就卓著，理应勒石以铭、垂示后人，于是议定在本年清明立碑一座。

在清代，墓表文由谁撰写是很讲究的，执笔者必须是本地既有声望，又了解蒲松龄的士人(或其后人)，他们想到了蒲松龄的挚友张筠庆。张筠庆也是淄川人，写得一手好诗，有“冠古之才”，他与蒲松龄年龄相仿、爱好相似，少年时即相知，曾结成“郢中诗社”，切磋文章道义。遗憾的是，张筠庆此时已去世多年，但他的从子张元从小跟随他学习，也是地方上的名士，对蒲松龄的生平和著作也很熟悉，请张元出手再合适不过了。

张元没有推辞，他从求学、成就、品格、生平等方面，用饱含感情的笔墨，写成了“柳泉蒲先生墓表”。文末有铭：“有文不显，有积不施，蓄久而炽，为后之基，以征以信，视此铭辞。”“柳泉蒲先生墓表”形式上和唐宋时期流行的墓志铭相同，只不过不是埋入墓中，而是立于墓前，所以称为“墓表”。

得到张元的墓表后，蒲氏后人非常满意，即延请名匠镌刻于青石之上，并竖立于蒲松龄的墓前。碑文阴刻，有座无帽，碑额为“柳泉蒲先生墓表”，正文共15行、每行约50字，共676字。

之后的240年里，这座石碑挺立在松柏丛中，默默地陪伴着“料应仄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的蒲松

▼蒲松龄墓碑和碑亭。



龄。除了清明时节家人前来祭奠、文人墨客偶来凭吊，没有人打扰他的安宁。直到上世纪50年代，石碑依然完好，当时山东省有关部门曾派员探访蒲松龄墓，时任山东省文联主席的著名小说家王统照，1956年在《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一文中曾写道：“蒲松龄的坟茔，虽经过这多年种种兵火，却还没有毁坏，墓碑也没扑倒或弄去垫了猪圈，铺了道路。”

墓表在蒲松龄研究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初，胡适考证蒲松龄的生卒，以及《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否为蒲松龄等问题时，就将张元所撰墓表作为基础资料，但胡适当时没见过拓本，更没见过原碑，只能使用各种文献中的引文。这些引文在传抄中难免有错讹，如蒲松龄的卒年，有的材料作76岁，如《国朝山左诗钞》；有的作86岁，如坊间流传的石印本《聊斋文集》收录的墓表全文，称蒲松龄的享年为“八十有六。”有考据癖的胡适为此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写成《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一文，断定蒲松龄卒年为76岁，非86岁。这篇文章被胡适视为得意之作。

同时期的另一位研究者淄川人路大荒，也对“蒲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以同乡之便，广泛搜集蒲松龄遗著。1934年，他到蒲松龄墓前，拓制了墓表，获取了第一手研究资料。得知学术大家胡适对“蒲学”有浓厚兴趣，路大荒还邮寄了一份拓本给他。

不过，由于年久，蒲松龄墓表的底部已被落叶和泥土淤积覆盖，路大荒的初拓本是不完整的，每行都缺少最后四个字。为此，胡适又给路大荒去信，请他清除积土，重拓一个完整的版本。当时已经是十二月，鲁中地区天寒地冻，拓印所需的蜡墨无法使用。路大荒冒着大风，连续跑了四次，才勉强拓制完成。胡适收到完整拓本后，专门写了一篇《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对路大荒表示感谢：“他的热心使我们今日得读此碑的全文，得知蒲松龄的事实，得解决许多校勘和考据的疑难，这是我最感激的。”

在次年的一场学术论战中，这两份拓本帮助胡适一招制胜。1935年7月，有人在《北平晨报》发文，质疑胡适的“蒲松龄76岁”说。胡适即拿出路大荒寄给他的墓表拓本，证明自己的正确：“我可以报告，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至今还在淄川，全碑完整。我已得着两份拓本，碑文中正作‘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76岁’。”

然而，经历了无数风雨屹立不倒的石碑，却在1966年8月21日被推倒砸毁了。

幸亏路大荒等人留下了蒲松龄墓表的拓本。1977年，蒲松龄故居被确定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对墓园的重修也提上日程。1979年3月，筹建中的蒲松龄纪念馆负责人专程到北京，拜访了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请他题写了“蒲松龄纪念馆”“柳泉”“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等字样，用作各处的标识。当时墓表还没有重立，茅盾题写墓碑时，特意在落款前加了“原有一七二五年淄川张元撰之墓表”一句，后来一并刻石立于蒲松龄墓碑的亭前。原来立在碑亭之中的墓表，蒲松龄纪念馆也作了重建，为了修旧如旧，他们四处搜求墓表拓本，依照原样重新镌刻。

蒲松龄墓园现在是“聊斋园”的一部分，目前整个景区正在紧张整修中，有兴趣的读者以后可近距离瞻仰这座有故事的墓表。

(本文作者为山东即墨人，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山东大学知新楼前的王普纪念铜像。

□王任

王普1902年出生于沂南县依汶镇，是沂蒙山走出的第一位留洋科学博士。作为中国核物理学先驱，王普先生曾经闻名于海内外，载于世界科学史册，但在故乡他的名字却不为人所知。

王普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升入北大物理系。1928年秋，王普的老师、物理学家丁西林介绍他去“中央研究院”工作，王普在物理所跟丁西林，同时又在地质所跟李四光做助理研究员。一年后，王普到济南担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为山东大学)聘王普创办物理系。

为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王普于1935年秋考取山东省公费生，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威廉皇家科学院的达莱姆研究所研究核物理学。该研究所是世界核物理研究三大中心之一，王普是继王淦昌之后到这里学习的第二个中国人。他于1938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转赴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仍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

对于王普的历史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冼鼎昌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他取得科学博士学位的1938年，就在那个研究所里传出了划时代的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的消息。得到博士学位后，王普到美国卡内基学院做了一年与裂变有关的研究，和同事发现铀和钍的原子核在裂变时缓发中子的现象，这个发现在核能的和平应用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仅是见证了核裂变时代开始的中国人，也是最先在核裂变领域里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中国人中的一位。”

冼鼎昌先生还忆及：“王普教授的名字，我是在大学四年级时在卢鹤绂先生的课上第一次听到的。在课上，卢先生一板一眼地讲述‘我的朋友王普教授’，

的重要发现——缓发中子现象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39年1月26日至28日，第五届国际理论物理学会会议召开。王普是与会的唯一一个华人学者和亚洲学者，这次会议也被看作是一次世界物理大师的聚会。1月28日晚间，由于离会场较近，美国卡内基学院地磁学系的R.B.罗伯茨、R.C.迈耶尔和王普等人赶回卡内基学院地磁学系实验室进行了原子核裂变实验演示。

1939年2月11日的《科学简讯》正式报道，罗伯茨及其同事们在1月28日“晚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夜实验会议上”，向玻尔和费米展示了核裂变碎片的存在。随后，王普和罗伯茨等人合作，3个月内内在《物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4篇文章，其中2篇涉及了铀和钍在裂变中发射缓发中子的研究。1939年，我国《科学》杂志介绍说：“王普博士除参加此次核子分崩表演成绩优异外，近复发现迟发中子及原子能之实际利用理论，已由卡内基学院向美国特许局注册，蜚声国际，为国增荣，难能可贵。”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王普即重返山大，任物理系主任，代教务长。1947年秋，王普应聘到美国国家标准局担任辐射物理学研究员，研究X射线物理学和核物理学。

新中国成立不久，王普即写信表示了回国的愿望。1956年8月，王普借赴欧洲参加学术会议的名义，在我国驻荷兰使馆的协助下回到祖国。到北京后，他受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高等教育部部长李云扬和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等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根据王普本人坚持回山大的意愿，他再次回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筚路蓝缕地在山大创办的粒子物理与核物理专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56年之后，王普还曾兼任政协山东省第一、二、三届常委，省物理学会理事，青岛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

王普先生是山东大学物理学科的主要创立者，也是山东省物理科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王普先生晚年在山东大学只带了两位研究生弟子，一位名为李惠信，一位名为张乃健。2010年10月，一尊王普纪念铜像在山东大学代表性建筑——知新楼前落成，一本厚重的《王普先生纪念集》正式出版，一场纪念王普先生的学术座谈会顺利举办。

王普先生好像从历史中走来了，但是由于研究领域的关系，在家乡他的名字依然少为人知。当年，他从家乡走向世界，并做出了重大的原创性科学贡献，对于家乡人而言，是难得的励志楷模和学习榜样。期待他的贡献，能被更多家乡后学所熟悉，也为沂蒙山竖起一座科学巨匠的精神丰碑。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

投稿邮箱：
qlwbrwq@163.com